DOI:10.19359/j.cn31-1004/j.2008.03.017

我与音乐人类学:当下最关注的论题(五)

——杨燕迪教授访谈录

黄婉(以下简称"黄"):您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包括音乐学方法论、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批评与分析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您还参与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建设工作。因此想首先请您谈谈,作为长期立足西方音乐研究领域的学者,您个人的学术兴趣与音乐人类学具有怎样的渊源关系?

杨燕迪(以下简称"杨"):首先,谢谢你的此次采访——因为这提供了一次机会,使我可能以较为随意的方式来清理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相关学术思考。平时,由于承担相当沉重的行政事务和相当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难得有时间和精力来整理和反思自己。实际上,我对整体意义上的音乐学的学科意义、定位和发展一直比较关注,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的个人兴趣所致,另外一方面也是当前音乐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发展势头相当迅猛的现实压力。你刚才提到,我的学术涉猎领域比较广泛,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一直希望,避免从单一学科的视角和视野来定位自己,从而能够保持对音乐学这门学科乃至对整个人文学科的宏观性关怀。我甚至努力尽量让自己多知道一些文史哲等其他姊妹学科(特别是哲学、文学理论与批评、艺术史等)的学科动向,以便能为自己提供一些参照和鞭策。我想,也许正是这种较为宏观的学术旨趣和较为强烈的交叉学科意识,使我很自然与音乐人类学在学术意识上产生了某种共振——尽管我的学术兴趣一直以"艺术音乐"[art music]为中心。至少在一点上,我想,我个人的思想认识和音乐人类学的学理前提是完全一致的,即,认为音乐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音乐的核心所在。这也就是说,理解和认识音乐,以及享受和鉴赏音乐,脱离了产生音乐的具体文化"原境"[context],音乐就会变成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我记得,美国著名的音乐人类学家(或称民族音乐学家)曼特尔·胡德[Mantle Hood]在1971年出版过一本学术专著,名称是《民族音乐学家》[The Ethnomusicologist]。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曾从上音图书馆借出英文原著阅读过,内容是讲述胡德自己的田野调查的实际经验,以及他通过与爪哇土著人的接触,对他的人生观和音乐观的影响。我惊喜地发现,为这本书写序的居然是那位以《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一书的"文化史"笔触而享誉欧美音乐学界的保罗·亨利·朗[Paul Henry Lang]。朗在这篇序言中号召,所有音乐学的学子,包括从事西方艺术音乐的研究者,都应该认真阅读此书,因为此书提供的是一种与人生相关联的、与文化相关联的音乐思考和体验方式。大家也许知道,我在前几年组织翻译了保罗·亨利·朗的这本音乐文化史的扛鼎之作《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的中文全译本。可以说,朗在此书中所展示的那种将音乐与人类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紧紧相连的音乐思考方式和音乐描述方式,对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就此而言,我想,我与音乐人类学之间,在深层的学理上真是有某种道不清的缘分。

黄:音乐人类学的任务是对各音乐文化在认知的基础上,对其艺术价值和独立的社会文化意义体系进行解释。其终极目的是通过音乐达致人文理解。您在《作为人文学科的音乐学》一文中认为:音乐学的研究增加了我们对音乐以及人本身的理解;音乐学与历史、哲学、文学研究等等这些人文学科的最终目的并无二义——即通过研究和认识达到理解。那么,是否可以说,同样把"理解"作为终极目标的音乐人类学,对于"音乐学恢复其人文学科性质"具有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推动作用呢?

杨:我或许并不完全同意你刚才有关音乐人类学的任务和目的的定义。在我看来,音乐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分析和研究各个不同的族群和人群在各自不同的社会生活中应用"音声"材料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蕴,以及产生这些"音声"材料的内在机理和风格条件。至于这些音声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味",我想,那倒并不是音乐人类学最关心的东西,或者说,音乐人类学往往会追问,这些所谓的"价值"和"意味"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约定和社

会前提。也就是说,音乐人类学会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质疑一切宣称具有普适性的东西,因而这门学科的内在精神是比较靠近“左派”的。因而,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音乐人类学会与“反欧洲中心论”、“文化价值相对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等等相对比较“后现代”的思潮达成一致,并形成合流。也正在这层意义上,我能感觉到,音乐人类学所代表的这种批判性思潮,与我本来隶属的研究西方艺术音乐的所谓“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之间,形成了某种内在的紧张。当然,西方的音乐史研究,在近二十年内也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很多音乐人类学中“耳熟能详”的观点和角度,比如“社会性别”和“性征”研究[gender studies],也都悉数进入了西方艺术音乐的研究。但是,我依然认为,音乐人类学与历史音乐学之间,或者说,这两门学科所各自关心的对象——民间音乐与艺术音乐——之间,还是有重大的差别。仅提一点,民间音乐的风格形成基本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而艺术音乐中的某些风格则是高度个人化的产物。因此,说到对于人的理解,特别是个人的创造性产品的理解,音乐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仍然有不同的指向和旨趣,不应该被混淆。不过,我也怀着喜悦的心情看到,音乐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中近来也出现了越来越注重个人经验和历史维度的倾向,也就是美国著名学者赖斯[Timothy Rice]所谓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创造”的新模式。而且在赖斯的著述中,我们看到,他也注意借鉴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的学说,这不啻意味着音乐人类学与历史音乐学之间的进一步靠近与弥合。如果说在原来的学科框架中,音乐人类学更为注重理解群体性的、社会性的“人”(因而更为靠近现当代的社会科学),而历史音乐学更为注意理解个体性的、历史性的“人”(因而更为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那么,现在看来,这两者之间,正在走向对方并互相靠拢。

黄:据悉您将在E—研究院第二个建设周期内完成一本专著《音乐人类学视角下的西方音乐文化批评》。想请教您,和其他视角相比较,音乐人类学视角下的西方音乐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或者说该视角对于西方音乐研究具有怎样的特殊价值?

杨:这个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命题作文”,但也是我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自然产物。我想,我会以西方歌剧为中心原点,来展开我心目中的文化性批判和解读。最近十多年以来,我一直比较关注歌剧史的研究和歌剧剧目以及演出的评论与解读。在这方面,我希望是学术研究、翻译引进和现场评论几个方面齐头并进。当然,毕竟精力有限,做得还很不够。最近我院出版社出版了我在多年前翻译的一本歌剧研究名著《作为戏剧的歌剧》(收入“上音译丛”),另外我的一位研究生周彬彬(音乐文献编译专业)也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歌剧与观念:从莫扎特到施特劳斯》一书。这两本书可以说是英语世界中歌剧研究著作中最有特点、最有影响的佳作,前者是从戏剧角度剖析歌剧,后者则是从思想史角度观察歌剧,均是从音乐之外的文化性视角来切入音乐,相信会对我们认识、理解和研究歌剧产生积极的作用。在西方艺术音乐的所有体裁类型中,歌剧是最具有社会关联度和文化辐射性的一个门类,因而从歌剧着手,有利于我通过音乐人类学式的文化视角来考察和批评这种西方特有的音乐—社会现象。关于通过音乐人类学的文化视角来看待西方艺术音乐,应该说已有先例。例如美国民族音乐学的泰斗人物布鲁诺·内特尔[Bruno Nettl]就曾写过一篇相当出名的文章,用他自认独特的视角来解读莫扎特音乐的文化与社会条件。但是坦率讲,内特尔的那篇文章并不十分精彩。原因是,作者仅是用一些比较概念化的理论框架来生搬硬套,尽管触及了莫扎特当时的社会—思想生活状况的一些表层,但没能深入到音乐的内在机理中说明问题。这样看来,仅仅靠独特的视角还是不行,最终还是要看研究者本人对研究对象有无深切而长时间的体认和感受。这是急不出来的,需要积累,需要耐心,更需要个人的兴趣和投入。

黄:请您谈谈西方音乐研究如何从早先的强调学科“自立”和“自足”逐渐介入中国当下的音乐文化生活?或者说目前的西方音乐研究具有怎样的中国意义?

杨: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对我而言有针对性的问题。的确,1980年代中期,我刚刚研究生毕业(硕士)的时候,我比较强调更

为“纯粹”的“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当初为了强调音乐学的理论研究具有自足性意义的“矫枉过正”。我想，凡是在当时的中国的音乐环境中有过学习和研究经历的人都知道，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实用主义”理念的左右，中国的音乐界对于音乐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共识——音乐学作为学术知识体系，它具有某种超越实用功能的自足性意义。我甚至怀疑，直至今日，这种共识是否已经明确和稳固。“理论为实践服务”，往往被狭隘地理解为“理论为创作（表演）实践直接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学科的“自足”和“自立”就具有某种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到了今天，我想，人们的思想状况和认识水平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种要求理论直接为实践服务的思想，我认为已经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音乐学的边缘化和概念模糊化仍然在继续。一个突出的例证是，我们现在都习以为常的高校学科目录中，“音乐学”被当作整个音乐学科的总名称。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大音乐学”（指整个音乐的学科，包括作曲、表演和理论研究）和“小音乐学”（指音乐的理论学科）之分。这样的学科名称，对于我们从事音乐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不啻是学科定位的自动取消。当前，音乐学是什么，音乐学家是谁，由于这样的学科目录的误导，恐怕会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对此我感到悲哀。也正是因为痛感音乐学和音乐学家在中国音乐生活和知识生活中的功能与定位模糊，我才呼吁，音乐学家应该主动介入中国当下的音乐生活和文化生活，尽可能地发出知性和智性的成熟声音，并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听到。我自己一直是《文汇报》和《读书》等这样的思想文化界报刊的忠实读者，并有幸忝列为作者，这也是想取得某种与更广泛的思想文化界的沟通。具体到我们自身的学术研究，包括我所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我也越来越强调课题的“当下性”和“中国性”，以加强我们自己与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关联。这并不是要求，研究的课题一定要是当下的什么问题，或是中国当前的什么现实，而是要求，所研究的课题与当下的中国现实具有某种内在关联的问题意识。即便是西方音乐研究，我也希望这种研究的内在问题是中国式的。尤其我认为，西方社会是第一个走入“现代性”的社会体系，因而在我们中国步入现代性社会转型的当前，理解和研究西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如果在其他的学科领域，如文史哲，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为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必须要研究和了解西方，我看不出为什么音乐会是个例外。总之，研究西方和世界是为了中国，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想，有了这样的意识和理念，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黄：作为E一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同时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领导，您如何理解音乐人类学E一研究院的工作在学科建设中起到的作用？

杨：我有幸作为上海市高校音乐人类学E一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目睹并参与了这个特殊的研究共同体的发展和建设。应该说，通过这几年的发展，这个虚拟式的“研究院”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也取得了诸多宝贵的学科建设经验。我觉得，E一研究院在充分发挥首席研究员的统领作用方面，在学科管理运作的灵活机制方面，在学术成果的集聚效应方面，以及在促进新兴学科点的生长效率方面，都已经成为上音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明显亮点，值得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在前不久上海市教委召开的一次重点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我提议，应该在国家重点学科、市重点学科和学校学科建设等几个不同层级的学科建设中，吸收和借鉴E一研究院的诸多建设、考评理念与经验。我衷心祝愿，我们的这个E一研究院取得更多的优良业绩，中国的音乐人类学乃至整体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学取得更大的进步!

被采访者简介：

杨燕迪：男，1963年5月出生，博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一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采访者简介：

黄　婉：女，1973年5月出生，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洛秦教授，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特约记者。